

# 受善与赌博：从村落斗牛活动 看企业家慈善项目的困境\*

刘怡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通过考察云南省 HD 自然村传统的“斗牛活动”，反观企业家慈善项目在村内的困境。作为“文化小农”的村民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会更注重社会身份和文化地位的确立而非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家设立的项目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村民增加了收入，但对传统斗牛活动的排斥体现出企业运行过程中现代经济理性与村落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最终导致慈善项目在村内陷入困境。

**关键词** 村落文化；慈善项目；文化小农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6) 02-0040-08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6.02.006

## 一、“理性小农”、“道义小农” 与“文化小农”

今日中国，各类慈善项目大量涌现，初衷虽值得称赞，却大多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现有文献讨论这一问题时主要从施善者的角度出发，探究官僚机构、宗教组织、各类 NGO、企业以及个人等从事慈善活动的动机、方式和效果，从受善者角度考察慈善项目的研究则相对较少。<sup>[1]</sup> 本文以云南省迪庆州的 HD 自然村为例，尝试透过村落传统的斗牛活动，反观村民对企业家慈善项目的认知和因应。

关于农民的经济行为，学界长期存在“理性小农”和“道义小农”两种经典的理论。前一种将农民的行为视为理性的选择。舒尔茨认为小农并非慵懒和缺乏理性，他们作为“经济人”并不逊色于任何企业家。传统农业虽然可能缺乏资源，但并非效率低下。一旦有经济利益刺激，小农便会追求利润并改造传统农业。<sup>[2]</sup> 在此基础上，波普金提出了“理性小农”的概念。他认为小农的农场可以被比作资本主义的“公司”，

他们会在权衡长期和短期利益之后，最终做出最合理的生产选择。<sup>[3]</sup> 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将村民行动的基础看作是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第二种理论试图对此进行批判和修正，强调小农为了生计而生产的一面。蔡雅诺夫对苏联的小农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的利益算法不适用于小农。他们生产的主要目的是家庭消费，而不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sup>[4]</sup> 斯科特承继蔡雅诺夫的传统，在《小农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叛乱和生计维持》一书中，提出小农经济行为的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他强调农民的生存伦理，认为他们生活在村落共同体中，通过互惠的方式共同生存，对抗外来压力。他们的行为是保守的、防御性的、以生存为基础的，因此他们会极力反对各种程度的冒险。这种理论强调农民行动的原则是安全，而不是经济利益最大化。<sup>[5]</sup>

这两种理论对我们理解农民的行为有着重要启示，但在 HD 村的案例中均不能完全适用。企业家 C 总试图通过设立慈善项目的方式帮助该

(收稿日期) 2015—12—03

(作者简介) 刘怡然(1986—)，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第 57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编号: 2015M571204)。

村村民致富，她不仅给予了资金资助，还为村民提供了生产支持和销售渠道。项目成立之初，虽面临一定的风险，村民仍全村参与其中。项目稳定之后，村民若在其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即可获得更多收入，但他们却常以“人手不够”或“时间不够”为由，不愿扩大项目的规模，也无意在其中投入更多的资金。<sup>①</sup>相反，他们将相当一部分闲置资金用来参加村内的赌牛活动。这虽然偶尔能为村民带来回报，但并非稳定的收入来源，甚至还有输掉很多钱的风险。这些行为既不同于“理性小农”中强调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也不同于“道义小农”中强调的安全原则。可见，理解这一案例需要寻求其他的解释框架。

有学者指出，现实中的农民很难被简单地贴上“道义”或者“理性”的标签，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到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背景的制约。而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趋向于将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认识统一起来。<sup>[6]</sup>在对中国华北农村进行的研究中，杜赞奇指出，华北的农民同时兼有这两种特征，并会随时根据现实情况调整行为方式。<sup>[7] (P.93)</sup>黄宗智则将农民置于一种阶级的视角中分析，认为不同阶层的小农有着不同特性。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小农的生产行为易受到更大利润的诱导，而较为贫穷的小农首先考虑的往往是生存因素。<sup>[8]</sup>在本文的案例中，HD村只有极少数村民非常富裕或者非常贫穷，绝大多数村民家庭的经济水平相差不大。参加企业家的项目后，村落整体经济水平有所提高，但并未出现明显贫富差距。因此，本文探讨的主要村民群体的生活水平处于温饱和富有之间。

笔者通过了解和观察发现，企业家设立慈善项目之前，村民的收入虽可以满足温饱，但几乎没有结余；参与项目3年后，村民家庭经济日渐宽裕，普遍修建了新房，购置了摩托车、拖拉机等现代交通和生产工具，但他们却不愿在项目中投入更多资金和精力。与此同时，村内赌牛活动则因村民的积极参与而日益兴盛，这使得原有项目的推进和新项目的开发都步履艰难。企业家认为村民受“小农思想”的束缚，不愿辛勤劳动

而期待通过赌博一夜致富。这种观点失之简单，忽视了斗牛活动的社会功能及其对村民的意义。马斯洛曾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第三、四两种需求都是社会性的。马氏认为这几种需求的层次从低到高排列，当前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努力满足后一种需求。<sup>[9]</sup>这一理论可为我们对HD村案例的理解提供一些启示，即村民在提高收入之后，对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需求不断增强。这些需要植根于村落文化并通过其实现，参与斗牛活动恰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本文因此提出“文化小农”的概念，认为村民虽然希望提高经济收入，但当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他们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对身份认同和文化地位的追求逐渐凸现出来。慈善发展项目虽帮助村民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企业家所设项目背后的经济理性与村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存在深层的冲突，因而遭到村民冷遇。企业家未意识到这一点，导致其慈善项目难以按计划向前推进。

## 二、企业家慈善项目与村民参与

云南省迪庆州的HD村<sup>②</sup>地处三江并流的腹地，坐落于山腰，是一个风景秀丽的自然村落。全村共约50户人家，260余位村民，以纳西族为主。行政上，它与周围其他13个自然村同属于QB村，每个自然村为一村民小组，由QB村村委会管理。HD组村民的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并不富裕。企业家C总在村里出生，但上学时即离开村落，后在外创业、成家。其母亲是HD组第一位中专生，父亲来自丽江，对村落颇多贡献。C总承继家庭传统，自己创业有成后，希望与其兄弟一起帮助村民致富。他们将村内的主要道路改造成了水泥路，为每家每户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对经济窘迫的村民给予了一定经济支援，并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然而，C总逐渐发现这些方式缺乏可持续性，无法从根本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准。于是兄妹三人商定，在村中设立发展项目，为村民制订生产计划，并向他们

<sup>①</sup> 采访 - LXN20141029。

<sup>②</sup> 本文中分别用到HD村和HD组，两者所指一致。前者的“村”指的是自然村，后者“组”指的是在行政村范围内的村民小组。

提供资金、技术和销售等方面的支持，希望由此使村民生活达到“城里人的标准”。<sup>①</sup> 这些项目与一般“企业/公司+农户”模式不同，企业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盈利，而是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为此，C总甚至中断了在其他地方开展的一些利润更高的商业活动。因此，这些生产项目实质上属于慈善性质。

2009年，C总和哥哥一起在村内引入葡萄种植项目，成立了“HD农场公司”。C总将其定义为全体村民的公司，鼓励村民参与项目，并以山顶上的闲置土地入股，参与分红。同时，她聘请了组内几位“可塑之才”担任公司的重要职位。<sup>②</sup> 这些人大多在组里拥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通过这种人事安排，C总一方面利用有影响力的村民协助她在村内从事项目建设，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更好地与村民沟通，使他们相信公司代表他们的利益。葡萄项目的设立旨在通过改变村内产业结构提高村民收入。C总一方面为村民提供葡萄的种子并培训相关的种植技能，同时为他们搭建销售的渠道。在村民遇到困难时，她还出资补贴生产工具以及肥料的花费。葡萄成熟之前，C总与其哥哥成功地说服当地政府向村民提供一定的补助。2011年葡萄收获后，每户村民通过种植获得的年平均收入逐渐从3千元提升到1万元左右。同时，其他组的村民也因到HD农场公司帮工而增加了收入。因此，发展项目设立后，整个QB村的经济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在C总看来，这只是个开端，她对于项目的前景和村落的未来抱有更高的期待。她不仅计划在村内设立属于村落的酒庄，自己生产葡萄酒，还陆续增设了蜂蜜养殖、苗圃培育、生猪培育等项目。C总称已为这些项目找好销路，村民只需投入一些基本的资金和劳力，即可稳获收益。但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大约九成村民不仅没有踊跃参与新设项目，对于葡萄项目也日益消极，无意投入更多精力以提高产量。他们甚至不愿再从事种植和管理活动，而将种植葡萄的直接租给公司经营，只收取租金。C总认为，村民的

这一选择不仅使他们自己失去了增加收入的极佳渠道，而且给她本人带来很大的负担。由于村民不愿将闲置资金投入发展项目，她必须经常注入资金以维持项目的运作。C总曾情绪激动地对笔者说“这些项目的设立是希望大家共同致富，而非一起灭亡。”<sup>③</sup>

当被问及不愿参加项目的原因时，村民往往称“时间不够”或者“家里人手不足”。<sup>④</sup> 然而，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形并不相符。村民收入提高后，购置了新的交通和生产工具，为农业活动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力。例如，从前秋收时间至少要持续两个多月，而现在短则半月，最长也只要一个月。同时，由于发展项目提供了就业机会，一些原本在外地打工的青壮年也回到了家乡，因此村中并不缺乏劳力。可见，村民自述不愿参加项目的理由难以成立，他们对于企业家所设项目的冷淡态度当另有缘由。

项目初始时，虽有少数村民心存疑虑，但全村村民无一例外地参加到了葡萄种植的项目中。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家的整个家族在村里威望很高，他们的号召成功地调动了村民参与项目的积极性。有村民回忆说“刚开始种葡萄时我们也犹豫过，但是C总在全村开会，说种葡萄一定比种庄稼好，我们相信她。”<sup>⑤</sup> 另一方面，村民个体也受制于来自集体的压力和影响，有村民说“那时候全村都要种葡萄，大家都种我们也不好不种。”<sup>⑥</sup> 还有村民说“大家都说种葡萄，我们就觉着应该没问题。”<sup>⑦</sup> 2011年葡萄开始结果，在后续的三年中，村民种葡萄每亩能稳定获得2100元以上的收入，比原来种庄稼高出近2/3。然而70%的村民却并不愿意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增加葡萄产量，而是倾向于将葡萄地按照公司保护价每亩1800元租给公司经营。村民大多表示，种植葡萄远比种植庄稼要困难得多，不仅需要修剪、拔草、喷药、施肥等多道程序，还需要懂得天气、土壤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一些专业的技术。相比起来，他们宁可把葡萄地以稍低的价格

① 采访CJY-20140829。

② 采访CJM-20140830。

③ 采访-CJY20141020。

④ 采访-LXN20141029。

⑤ 采访-WJK20141010。

⑥ 采访-WSQ-20150823。

⑦ 采访-MXQ-20150912。

格租给公司，自己做一些传统且相对轻松自由的农活，例如采菌子、打核桃、养牲畜等等，用村民自己的话说是“不想过得那么累”。<sup>①</sup> 从此可以看出，村民开始参加项目时就并非完全出于“安全”或者“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家整个家族在村内的号召力，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影响。而在村民获得稳定的收入后，也并未按照企业家期待的那样考虑如何扩大生产的规模，加大生产的力度。相反，他们追求的是更轻松的农活和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可以看到的是，村民愈发频繁地举办各种活动，而村内已有的节日也举办得愈发隆重。

### 三、斗牛比赛：村中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

笔者2014年10月中下旬来到HD组，恰逢整个QB村一年一度的丰收节。这一节日意在庆祝当年劳动的成果并为来年的丰收祈福，是村内极隆重的节日，仅次于春节。节日期间，村内14个组用新收获的粮食做成各种小吃，轮流宴请其他组的亲友，并举行隆重的“斗牛”比赛。

一般情况下，丰收节只持续一天，宴请和斗牛都被安排在当天举行。然而2014年11月7日，HD组新上任的组长觉得本组已经颇具经济实力，因此决定举办一场规模空前、持续一整天的斗牛比赛。比赛前，两头牛会被分别带到场地的两个角落，以便人们近距离观察牛的头、体型、角的尖利程度等。每头牛身边不仅站着牛主，还有一位组织者，后者负责记录押注者的姓名和金额。押注活动分为场外和场内两种。前者形式自由，手续快捷，只要两人以上达成口头协议即可进行，赔率也自主商定。这种方式没有斗牛组织方的抽成，但赔付的保障相对较差，只适合范围小、金额少的赌牛活动。近年来占据主流的是第二种方式，即场内押注。赌资由比赛组织者负责收取，并进行严格的查核和监督，确保无误才能开始比赛。任何人都可以下注，押注金额从100元起，原则上没有上限。赌牛不设庄家，赔率无一例外地被规定为1:1。因此，双方的牛必须获得数额相等的赌注时才能开战，否则赔付无法平衡。<sup>②</sup> 这种方式可防止因两头牛实

力悬殊而使比赛失去悬念，也避免了一头实力超群的牛垄断比赛的情况。在押注的总金额中，组织的小组抽取7%付给胜利方的牛主，3%作为场地费。一个人若押100元且其所押的牛获胜，抽去牛主费和场地费，最终可得190元。通常，一场比赛的押注过程要花上一个小时甚至更久，而比赛则只需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便宣告结束。赛后，押中获胜牛的人即可找到比赛组织者领取本金和赔付。一场比赛的账目算清完毕，才会接着进行下一场。

企业家对村内的习俗非常了解，她一方面认为斗牛是传统活动，有保留的意义，另一方面觉得其中的赌博行为是愚昧的和不理性的。她曾对笔者说“这种风气太不好了，他们（村民）就想着一夜陡富，不愿意付出辛苦。这样只能把家都赌没了，怎么帮他们都没用！”在企业家的眼中，村民斗牛是期待不劳而获，然而她却未能认识到斗牛活动对村民的社会文化意义。

作为一场盛大的公共活动，斗牛比赛维系着各个小组之间的关系。以往斗牛活动基本在小组内部进行，现在绝大多数都来自QB村的各小组，这使村民小组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强化。QB村14个小组之间历来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村民来往频繁。斗牛比赛参与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加强了各组之间的联系。每当一个组举行斗牛比赛时，其他各组都会收到参赛邀请。如果某一组数次受邀都未参加，以后可能会被排除在邀请名单之外。这意味着该组被排斥到村落共同体的边缘，每个组自然都会极力避免这一处境。因此，每次斗牛活动中，基本上每个组都至少有一头牛出战。同时，尽管参赛者并不完全限制在QB村范围内，组织者在决定比赛名单时，通常会优先选择本村的牛主。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用库拉圈描述部落之间的网络关系，认为库拉圈中项圈和臂镯的传递表面上是财富的流动，但它们却并不被视作金钱或者通货，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背后的符号价值和社会意义。在这些物品给予和回馈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得到确认和强化。<sup>[10]</sup> 斗牛活动中虽然并无物

<sup>①</sup> 采访-LGQ-20150827

<sup>②</sup> 如果两头牛获得的押注金额不一致，例如一边获得5000一边获得6000则比赛无法开始。可以等更多人在5000的一边继续押注，或在另一边也获得5000元时停止收取赌金。

品的交换，但是各个小组轮流互邀的过程也是一种无形的交换，密切了各组之间的网络关系，从而强化了村落共同体的意识和结构。各组的村民共同参与斗牛这一公共生活，无疑也会增进彼此的认同感。虽然牛主可能出于获利的动机而参赛，组织者也可因赌牛者众多获得经济利益，但各组相互邀请的社会意义显然远超其经济意义。

此外，举办斗牛活动需要村民的相互协作，这也增进了小组内部的凝聚力。HD 组比赛当天，每家都准备了肉类和蔬菜（成本从总利润中统一扣除），并贡献一些柴火，在斗牛场附近堆成 6 小堆。一些妇女拿出自家的大锅，一起准备盒饭，以每份 25 元的价格出售。另一些妇女从小卖部暂借饮料，在现场加价出售，赛后将未卖出的饮料退还小卖部并付给一定报酬。盒饭和饮料等销售所得皆归全组所有。HD 组 2014 年丰收节一共进行了八场斗牛比赛，赌资总计约 17 万元，场地费收入为 5100 元。加上售卖饮食的收入，除去成本，最终净利润为 2.5 万元。全组约 50 户人家，每家可获 500 元左右。因此，举办斗牛比赛需要全组成员参与和贡献，分工合作，而最终的收益也是大家均分。这一过程将斗牛活动的文化资本转化成了经济资本，但隐而不显的是 HD 组的村民在协作和互助中还增进了情感，强化了小组内部的凝聚力。

最后，斗牛活动还是村民建立对小组和村落认同的重要渠道。赌牛过程中，村民们在押注时不仅根据牛的实力，牛主的身份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HD 组当天进行的八场比赛中，第一场押注的总额最少，只有 5000 千余元，这不仅是因为参赛的两头牛实力都较弱，更由于它们的主人均来自其他村落，既不属于 HD 组也不属于 QB 村的其他组。观看比赛的人多为 QB 村民及其亲友，对两头牛代表的村落缺乏认同。相形之下，在当天进行的第四场比赛中，观众约有 3000 人左右，押注总额高达 7.2 万余元，皆为当日之最。这一方面是由于对阵的两头牛各有特点，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一场东道主与外村参赛者的比赛。村民视之为“我们”与“他们”的较量，押注格外踊跃。虽然外村的牛体格更为强壮，在以往比赛中也战绩颇佳，但 HD 组村民并未因此

支持它。根据组织者记录，在 HD 组牛身上下注的人中有 70% 是 HD 组的人，其余 30% 的押注者也都与 HD 组有密切的联系。一名村民告诉笔者“想押哪头牛都可以，但是我都押自己组的牛，当然得相信自己的牛。”<sup>①</sup>

在格尔茨描述的巴厘岛斗鸡活动中，人们押注时遵循一种优先顺序：首先支持本宗族的鸡，其次支持联盟宗族的鸡，最后支持自己村落的鸡。格尔茨认为他们押注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押注的顺序和多少其实是对当地社会地位等级在比赛中的移植。<sup>[11]</sup>与此类似但又不尽相同的是，HD 组村民的押注行为中也存在类似的优先次序，在其中他们更注重的是社会身份的表达。当有本组的牛参加比赛时，他们都会优先在其身上下注。这显然不是一种完全理性的选择，而是认为自己有支持本组的伦理“义务”。押注者借此表达对自己小组的忠诚，是自己与本小组之间伦理关系的体现，同时也向其他组展示本组的实力。同样，当 QB 村和外村的牛比赛时，HD 组的人也会倾向于支持 QB 村的牛。村民赌牛行为的优先顺序是村民对小组和村落认同的直接反映，而这种行为反过来也进一步强化着这些集体认同。

#### 四、村落精英与企业家的角力

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文化活动，斗牛在维系村民之间关系和提供认同感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有着象征意义，其背后蕴含着颇为复杂的关系。企业家未能意识到的是，她在运行项目和反对斗牛比赛的同时，也是对村内原有权力关系的挑战。

首先，斗牛活动中暗含着村落社会的性别政治。在村民眼里，斗牛是充满力量的活动，象征着男人的阳刚气质，所以女性历来被排除在外。主导发展项目的企业家 C 总为女性，在她的帮助下，村里很多妇女走出家庭，开始工作挣钱或外出求学，开拓了眼界，也提高了经济地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村落的男权社会结构。然而，斗牛的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皆为男性，妇女完全没有发言权。一位在农场公司上班的妇女告诉笔者，现在家里的重要事情大都是夫妻两人商

<sup>①</sup> 采访 WZ-20141108。

量决定，但唯独在斗牛一事上，其丈夫却可以单独决定将相当一部分积蓄用于赌牛。<sup>①</sup> 男性们积极组织斗牛，并继续将女性排斥在外，在某种意义上抵制着发展项目对村落两性关系的影响，确认和巩固了男权社会结构。

此外，斗牛活动是想要成为精英的村民争取权力地位的重要领域。在布迪厄定义的社会空间中，人同时受到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也会通过对这些资本的争取和运用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sup>[12]</sup> HD 组现任组长原先并不属于组内精英群体，也不在农场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甚至因为自身能力较差被许多村民所看不起。但他一直对斗牛活动极为热衷，这可能是他当选组长的重要原因。企业家对当选组长十分不满，她对笔者说“他自己选（即推荐——引者注）自己当组长，村民也都不在乎，就投了他的票。他稀里糊涂当上了组长，但是一点能力都没有，整天就知道斗牛，一点都不关心组里的发展。”<sup>②</sup> 而组长自己的解释则颇耐人寻味“大家因为信任我所以选我，我致力于发展村内的斗牛活动，弘扬民族文化。”<sup>③</sup> 当选组长以后，他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组织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斗牛比赛。显然，他试图通过这次活动在组内树立声望，巩固其组长地位。

最后，斗牛活动还是现有村落精英维持权威的重要手段。如前所述，HD 组隶属于 QB 村村委会，组内除组长外，并无固定的自治组织，策划和组织斗牛是村落精英维护和强化其领导地位的重要途径，组内公认有才智的精英同时也是斗牛活动的中坚力量。丰收节前，组内精英在村长家中聚会商讨节日活动的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斗牛。参加会议的共 11 人，均为男性，其中 7 人在农场公司任职。他们掌握着 QB 村其他组及外村来参加斗牛的牛主姓名，由于政府原则上将斗牛的范围限定在小组之内，所以这些信息严格保密，只限定在几位精英之间。获胜的牛主通常可得到可观的收益，如果报名参赛的牛主较多，村落精英则拥有实际参赛名单的决定权。比赛前两天，组长宝哥在村内寺庙旁的会议室召集组内大会，每户须派至少一名代表参会。屋里

的桌子被拼成四方形，宝哥坐于正面中间，旁边为前任组长天哥，五哥、六哥、零哥等数位精英坐在两侧，村民们则取小凳在桌前坐成数排。宝哥和天哥商量后，给每户分配斗牛比赛期间的任务，其中精英负责最重要的事项。例如宝哥安排和监督斗牛的整个流程，支部书记老端担任斗牛比赛的主持和裁判，五哥和六哥记录、收取赌资和酬付赢家，零哥负责协调现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妇女并不参与与斗牛直接相关的工作，而是被委派在斗牛场附近售卖小食、饮料和盒饭，另有一些老人负责销售香烟。通过上述组织和安排过程，村落精英的领导地位在斗牛活动中不断得到确认和加强。

企业家不愿村民参与赌博，但她对斗牛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对村落精英原有权力的挑战和动摇，也遭到了村落精英的极力反对。双方虽然极少发生正面冲突，但暗中的角力却不难察觉。对于企业家的反对和干预，村落精英通常采取消极抵抗、搪塞敷衍的策略。例如，前任组长天哥颇受村民拥护，但 2014 年 7 月换届选举时却未续任。据他自称“在公司任职的同时担任组长不容易取得组内成员的信任，也会有人怀疑我是不是利用两边的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利。”<sup>④</sup> 然而，笔者访谈多名村民后发现，天哥的卸任似乎有其他考量。组长不仅需要管理村内日常事务，还肩负着组织斗牛活动的重任，但企业家对公司成员管理比较严格，不许他们参加与赌牛有关的活动。本次丰收节天哥悉心培养了一头牛准备代表 HD 组参赛，为了可以专心养牛不受到太多关注，天哥便辞去了职位。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在斗牛组织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在组内开会时仍有较大权威，并积极为现任组长出谋划策。

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斗牛比赛前夕，企业家召集公司员工开会，叮嘱不可参加斗牛，尤其不能押注。这使一些在公司任职的村落精英对公然参加赌牛有所顾忌，但并未阻止他们对斗牛活动的组织和参与。HD 组地势不平，原无理想的斗牛场地，经常借用其他组的场地举行。为了组织此次比赛，组长宝哥和几位村落精英商量之

① 采访 HHZ - 20141020。

② 采访 CJY - 20141020。

③ 采访 TB - 2014 1110。

④ 采访 TC - 20141019。

后，决定在山上开挖一块本组专用的场地。但他们看中的场地已被村民入股公司，其使用权已不属于村民，企业家准备在此建设葡萄酒庄。在外地办事的 C 总听说组里要用这块地举行斗牛，多次给公司总经理打电话，向他强调必须阻止组长开挖斗牛场。虽然总经理与 C 总关系密切，但他一直回复称自己并未听说。其实，他不仅早已得知此事，而且出面垫资 2000 元租来挖掘机。在组长和几位村落精英指挥下，斗牛场于丰收节 3 天前挖掘完毕。斗牛比赛当天，总经理自己离开村落以示回避。

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 1942 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杜赞奇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他将“文化”定义为“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其中包含“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并认为象征的价值可以使文化网络产生一种权威，而这也反过来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与荣誉感，让人们希望追求文化网络中的领导地位。<sup>[7] (P.9)</sup> 在 HD 组的村落文化中，斗牛活动象征着阳刚和威信，牵涉村落精英们和男性的权力。企业家与村落精英的矛盾表面上是对斗牛活动的不同态度，其实质则是对村落权威的争夺。企业家在村落中开展项目需要精英们的支持与协助，但项目所带来的变化却对精英的权力和地位产生了冲击。精英们虽然没有与企业家发生正面冲突，但他们在村落事务中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不愿完全按照企业家的期望行动。村落精英对企业家的敷衍搪塞、阳奉阴违，反映出发展项目设立后双方之间微妙而复杂的权力竞争。

## 五、结论

通过对 HD 自然村斗牛活动的深入观察和剖析，我们可以反观村民对于企业家慈善项目的态度，进而思考农民经济行为的特征。企业家设立的发展项目为村民提供了可靠的收入渠道，而且被证明是提高村落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然而，村民们普遍不愿积极参与项目，却热衷于举行斗牛比赛并参与其中的赌博活动。村民的这一选择表明，他们既非注重“安全第一”的“道义小农”，也不是极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小

农”。要理解村民的经济行为，必须考察村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

表面上看，村民对项目的冷淡和对斗牛的热情之间并无关联，但背后却有着一致的逻辑。在企业家看来，村民存在投机心里，不愿辛苦劳作而是期待不劳而获、一夜陡富。她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提倡村民将结余的资金投入再生产提高产量，反对他们将辛苦挣来的钱用于赌博。然而，她未能看到斗牛活动对村民的真正意义。斗牛活动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主办方、牛主以及押注的人带来收入，但由于斗牛比赛的规则十分特殊，通过赌牛迅速改变家庭经济水平的村民为数很少，这也不是村民热衷斗牛活动的最重要原因。在斗牛的整个筹办和举行过程中，村落共同体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得到巩固和维系，村落精英的权威和地位得以确立，一般村民也可在此过程中增进对村落的情感和认同。企业家将其作为一种赌博活动予以否定甚至干涉，这不仅对村内精英甚至整个男性村民群体的地位造成冲击，同时也威胁着村落共同体的内部结构。本文认为，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村民更在意的是提升自身在所处环境中的社会文化地位，而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村民更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增加收入的机会，而不是配合企业家深化和扩展项目。企业家正是未注意到这一点，才使得其慈善事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通过对 HD 组个案的考察，本文尝试提出“文化小农”这一概念，以期对关于农民行为的现有理论予以补充和修正。学界长期以来盛行的“理性小农”与“道义小农”两种解释为我们理解农民行为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它们均以经济利益作为农民行为根据，无法解释本案例中 HD 组村民不积极参与有保障的慈善项目而是热衷于更为冒险的赌牛活动的选择。本文认为，在基本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生活在村落共同体中的村民做选择时既非以规避风险，亦非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准则，而是更多受到地方文化的形塑。地方文化中包含的权力网络、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等都深刻影响着农民的行为。在此意义上，“文化小农”或可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农民行为和农村经济提供一种新的维度和深度。

(参考文献)

- (1) 王俊秋. 中国慈善与救济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 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罗红光, 王甘, 鲍江. 16位志愿者的180天 [R].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 (2) Schultz, Theodore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37.
- (3) Popkin, S.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1.
- (4) Chayanov, A. V. "On the theory of Non-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s," [J]. in Dan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eds., *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1966a: 1-28.
- (5) Scott, J.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34.
- (6) 郭于华. "道义经济" 还是 "理性小农" 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 [J]. 读书, 2002 (5).
- (7) 杜赞奇. 文化、权利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8) 黄宗智.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5.
- (9) Maslow, A.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 370-396.
- (10) 马林诺夫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441-443.
- (11)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516-520.
- (12)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J]. London: Routledge, 1984: 78.

**Receiving Charity and Gambling: An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of an Entrepreneur's "Charity Program"  
through Bullfighting Activity in a Village**

LIU Yi-r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732)

**[Abstract]** Using HD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as a case,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Bullfighting activity, from which the dilemma of the charity programs lunched by an entrepreneur could be observed. By putt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Peasa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hen basic living is secured, villagers' need for constructing their soci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status triumphs their need for maximizing economic interests. Although the charity program helped villagers increase their income, its rejection of the Bullfighting reflects that modern economic rationality in the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is contradictory with the social relation and 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village, which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dilemma of the charity program.

**[Key words]** village culture; charity program, Bullfighting, cultural peasant

(责任编辑 李 劼)